

古籍保护

专刊

本刊主编：刘晓立
版式统筹：常 英
联系电话：0311-88643113
投稿邮箱：liuxiaoli0119@163.com

藏书报

2017年3月27日

第6期（总第7期）

藏书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联合主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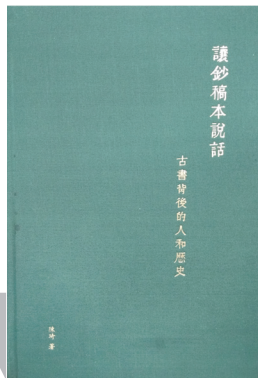
对话
DUHUA
CHENQI

陈琦：

那些与古书相伴的日子

□本报记者 刘晓立

陈琦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2017年1月



“陈琦在本书内所讲到的钞本和稿本都是他个人的藏品，他通过这种讲述间接地告诉大家，当遇到一本没头没尾的无名稿本时，不要轻易将其放弃，而应当运用各种知识，对它们进行仔细的研究与解剖。这之间所付出的辛劳与心理折磨，以研究的最终结果作为最高的奖赏。这才是藏书的乐趣，这也才是作为一个收藏者应当追求的一种爱书方式。”

——韦力·序

陈琦，一个有些书生意气的文青，一个有些传奇色彩的藏书人，一个不会做生意的生意人，一个相信古书会说话的“追梦人”……与古书相伴多年，陈琦做过图书馆临时工，写出了《武汉图书馆馆藏古籍善本书志》的经部；义无反顾下海做古书经营，却坚守本心致力于挖掘其中的“文化价值”；自娱自乐搞收藏，一手活字本医书，一手湖北的地方文献，做了数十万字的“书皮子”研究。近日，由藏书家韦力作序的陈琦新作《让钞稿本说话——古书背后的人和历史》面世。书中记录了陈琦几十年来与古书相遇的美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它是在我自己的‘朋友圈’煨的一罐心灵鸡汤”。

陈琦幼时从书本开始接触到传统文化，几十年来，从藏书、贩书，到写书，一直没有离开过书，他说：

“我没有其他爱好，也没有其他本事，只喜欢书，也只会看书，生活的需要让我也不得不在书本中谋生活，我不认为我这种将爱好和谋生结合起来的道路具有普遍意义，它只是我个人的‘归宿’。”“书”为何能有这么大吸引力？如何搞好收藏、经营，并让古书“说话”？一起听听陈琦的故事。

（详见第11版）



【日本考察
日记（一）】

2017 年 2 月中下旬，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组织 2016 级古籍保护与修复专业的 14 名研究生到日本进行了为期六日的教学实践，访问了包括东京印刷博物馆、日本纸张博物馆、神保町古书店街、庆应义塾大学斯道文库、国立国会图书馆、小津和纸、静嘉堂文库、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等 13 处有关古书、古纸的著名场所，学生们收获良多，一路上的点点滴滴，都为成为古籍保护与修复的“良工”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神保町古书店街：古籍再生与流动的大洋

□郑美玉

传说浴火凤凰在享寿五百年后，会自焚火化，然后从灰烬中重获新生。

浴火凤凰或许是一则神话，但其火后重生的精神意义，却值得我们追寻，就如古籍修复专业同学眼中的日本神保町旧书店街。日本古书藏家池谷伊佐夫曾这么形容神保町：“东京的神保町，就像伦敦的查令十字街、巴黎的塞纳河畔、北京的琉璃厂，是古旧书收藏者的圣地。”

被誉为“神保町的活字典”的八木福次郎在其出版的《旧书店手册》一书中曾娓娓道出旧书店的历史。“明治维新（1868 年）之后，在神田的周围建了很多大学，为了师生所需，各种专门书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1923 年，发生关东大地震后，物资匮乏的日本人发现旧书其实也挺不错，就产生了购旧书的需求，于是旧书店日见繁荣。目前神保町书店总数约 200 家，其中约 110 家是旧书店，约占东京都内旧书店总数的三分之一。岩波书店、小学馆等日本大型出版社的总部也设于此。”

神保町的旧书店都以经营和收购旧书为主要业务，不仅图书种类丰富，专业分

工仔细，且集中管理了许多旧书，为了收购回来的旧书能以较好的面貌再销售，店内的员工都有一套修复书籍的方法。笔者虽然不懂日文，看不懂书的内容，但欣赏书店的橱窗设计与书架陈列方式也是一种寻宝乐趣。

书街上每家书店都有着独特的销售专业与自我风格，有富丽堂皇如“一诚堂”；还有充满杂书堆的“大屋书房”。在大屋书房，除了进门处的左墙陈列着一架子整齐的古籍，店内的四周还堆放着许多看似“待处理”的书，在书堆中移动，必须谨慎、戒备与小心。笔者就曾在楼梯口角落的书堆里发现感兴趣的小书，书皮已残破，书内有污迹与虫洞，书中夹着字条写着“350”。原以为 350 日元也不贵，可以买回去练练手，结果到柜台一问，店员拿出书店专业编辑的古书目录，才知道 350 只是编号，实际价值是 4 万日元，也就是相当于 2400 元人民币，实在有点贵。

买不起古籍，唯有打肿脸充胖子的要了书店的目录。回家仔细阅读目录，发现这破旧的古书其实出版于 1854 年，已经

有 163 年的历史！如果笔者从店里角落随手翻出的小书都有这“分量”，那些被仔细呵护在橱窗里的古籍又会是什么等级的呢？

到神保町逛上一天，虽然对学生们来说，实际能采购的书并不多，但能看到古籍、二手书，并不是被社会边缘化的无用之物，也颇感欣喜。不得不说，神保町的古书店，是赋予古籍再生与促进古籍流动的生命基地。



印刷博物馆：跨越时空，看见不能见之物

□朱思怡

阅读是视觉和触觉的充分调动，正如墨与纸张激发的嗅觉体验，是阅读中难以割舍的乐趣。

东京印刷博物馆的标志是个象形文字“见”，代表着印刷术的意义——让更多的人看见因时间、地点所限制而不能见之物。博物馆通过引人入胜的导览，展现了印刷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过去的成长，是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改造，是未来的希望。

走进正门大厅是多功能展览室，这里会定期举办展览会、活动和不同印刷流派的合作研究会。我们到的 2 月 19 日，正好举办的是“世界书籍装帧设计纪念展”，展览集中了大量有创意的现代书籍装帧形式，拓宽了我们一贯对书籍装帧形式的认识。

随后，我们来到地下展示厅，这是个通过“感觉”“发现”“理解”和“创造”四维来排列的展厅。以壁画展示和影像感觉组成的印刷术起源介绍，冲击着我们的眼球。从洞窟壁画到石器记录，从拓片翻

印到机器打印，印刷术一步步引领着文明。

综合展示区内容丰富，按照“社会”“技术”与“表现”来展现印刷文化。博物馆的珍品文化财——17 世纪初期的骏河版铜活字和本木昌造制作的活字，都静静地躺在玻璃柜中，只要你愿意，就可以拉出展台下的椅子，打开设于附近的介绍视频，影音和实物的结合，让理解更生动。

各年代的印刷设备和还原场景，让参观者流连忘返。更为精彩的是展区中的“印刷之家”，可以让参访者亲身体验活版印刷的排版与打印。读者可以自己打份年历，或者给父母打份感恩卡，是一个美好的“创造”体验。

隔着玻璃落地窗，我们还看到了整柜的铅字、刻字机与圆盘排字机。两位老师傅在里面工作，就像是一个实体的小型印刷车间。我们了解到，这“印刷之家”除了可以让参观博物馆的人免费动手制作小卡片，也欢迎设计师或艺术家们利用工作坊的设备完成个人的创作。

我们还观看了日本京都附近古代城池“安土城”的 VR 电影，影片在还原消失了的城池的同时，让我们感受到了最先进的“文献记录载体”，立体展示使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

作为图书情报专业硕士，与一般参观者稍有差别的参观体会是，我们很惊喜地发现，馆内还有一个小而精的专业图书室。图书室藏了约 5 万册有关印刷专业方面的图书，并且设有可以检索的信息角，读者可以在图书室里检索博物馆信息、收藏品和图书，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走进纸张博物馆：感受认真的传承

□邱月

日本纸张博物馆位于东京都北区飞鸟山公园内，它的建立是为了帮助人们追寻制纸的历史，学习制纸的方法，并思考制纸的未来。

公元 610 年，造纸术从中国传到朝鲜半岛后再传入日本。日本人在学习的基础上有了自己的继承和创新，并形成了独特的“和纸文化”。在日本境内，有许许多多的造纸工厂，这也为制纸工艺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硬件支撑。

来到博物馆，门口就看见几个花盆里种植着不同的造纸原料，有三桠、楮树等。据馆内一位老先生介绍，日本的货币便是以三桠为原料制成的。

该馆共有三个常设展厅，其一展示的是现代纸质产业。在这，老先生为我们讲解了现代造纸产业的原料、生产工序、制

造机械等。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悬挂在博物馆展厅高墙上的一张巨大白纸。据介绍，这张纸是日本近期才用机器造出来的、世界上最大的洋纸，这种洋纸宽度为 9.33 米，理想条件下可以无限长生产，而且生产速度极快，一分钟可以生产 1800 米，相当于汽车时速 108 公里，令人惊叹。

第二展厅主要以纸的构造与再利用为主题。厅内展示了不同类型的纸张以及它们各自所用的原料，让参观者直观地了解到不同原料所造纸张的不同。我们围绕在一个陈列着不同纸张的旋转展示柜前，小声探讨着哪种纸可以用来作古籍修复中的溜口，哪种纸可以用来做衬页……同时，也认识到，在人类满足自己纸张需求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对环境的保护，对森林的利用应有节制，积极寻找造纸与生态

的平衡。

第三展厅介绍纸张的诞生与传播，展厅设计者将眼光放在文字载体的发展上，从罗塞塔石碑到各种古籍，再延伸到今天的多种纸张，一一向参观者展示出来。展厅内还有用纸做的衣服，用纸做的古城——熊本城模型等。去的时候，博物馆刚好在举办一个很有趣的活动，就是收集大家喝过的牛奶纸盒，用来制纸。参观完展厅，同学们还亲身体验了造纸。而前面提到的奶盒，就是纸浆的原料！

下午的飞鸟山公园阳光明媚，在纸张博物馆不远处，还坐落着飞鸟山博物馆和涩泽史料馆，大人们带着孩子来这里参观，了解过去、了解有关纸的知识，学习之余可以在旁边公园休息，让人感到日本文化的传承是认真而充满朝气的。



（本版图文均由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 2016 级研究生提供。）

亲近古书：做个有些“书生意气”的文青

藏书报：当初为了到图书馆接触更多的古旧书，宁愿做临时工，这是一时的“书生意气”还是坚定意志的表现？是怎样的机缘让你不惜一切投身进来？

陈琦：回过头去审视往事，很容易倒果为因。虽然我算不上是“书生”，冲动、意气却一直伴随着我，在反省过往种种时，总会想，当初要不一时冲动就好了。这也许就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冲动多了，也就不以为怪；意气多了，何尝又不能干脆视作是“坚定意志”的表现呢？

再说机缘，我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上学、成长于80年代，这算不算是一种

机缘呢？毕竟在上学、成长的过程中，我可能比现在的90后、00后更容易接触到传统文化和古籍，并且到现在都是一个喜欢传统文化的“文艺青年”，如果说我充斥着“冲动”的人生中有一样东西是坚定不移的，可能就是这显得有些好笑的“文艺青年”梦吧。

藏书报：在图书馆工作的这段经历对之后从事收藏和经营有何影响？

陈琦：刚到图书馆时，我还是20岁的毛头小子，穿着蓝或绿的军干服，显得很单纯。因为是临时工，我当时的主要工作就是打杂，写合订本封面、抄写分类卡片、新书上架、扫地拖地之类的。幸运的



是，老馆员们看我踏实肯干，又爱读书，都比较喜欢我，很快就任由我自由出入总书库，并耐心给我讲解书库结构、图书分类。后来图书馆搬到新址，各种规章制度越来越严格，别说临时工，就算其他部门、岗位的职工，想进出书库，都需要审批。所以，我真是幸运，赶上了“好”时候，遇上了一堆好人。我工作中受了教育：无论什么时候，尽可能对别人好一点；无论什么时候，要能看到别人的长处；无论什么时候，要尊重别人。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些和做经营、玩收藏没什么关系，但我总会回忆这些事。每当想起这些事、这些人，就会感觉有阳光照进心里。



对话
陈琦：

投身经营：热衷挖掘古书“文化价值”

藏书报：离开图书馆后，又投入到古旧书流通和拍卖工作，对此，韦力先生在新书序中似乎表示并不“看好”：爱书人能够做好经营吗？

陈琦：我请韦力先生给我的那本《让钞稿本说话》写了篇序言。其实，在之前韦先生给我做访谈时，我就一再和先生说，尽管秉笔直书，不要顾忌太多，也不必在意我会有何意见，然而，韦先生在访谈中还是以说“好话”为主。而这篇序言呢，算是多多少少指出了一些我的问题，虽然还是很隐晦，但毕竟不能算是“好话”。我没有将韦先生的这些文字进行“处理”，而是原样保留了下来，不是我没有看出来，而是觉得这样才对。很多朋友都曾直言我“不会”做生意，也相信大家对我的拍卖经历会有些看法，我本人呢，也知道自己不适合做“生意”。但是，既然没有其他本事，必须得做古书这门子生意，那就做呗。生死关头，早鸭子在水里也得使劲扑腾不是？当然，我对自己做生

意的要求也不高，算是就坡下驴吧。既然做不好生意，那就多看看书吧。这不是取舍的问题，而是另一种趋利避害。爱书人是可以做好经营的，我们古书行有很多这种爱书人，从前就不缺，现在也不少。只是，我不算。

藏书报：如何在经营中挖掘“书”的价值？

陈琦：古书的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多元的。站在古书经营的角度，理应以经济价值为主要判断标准。那么，经济价值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说来说去，除了文物价值，也许都会往古书的历史价值、文献价值上面扯。这样当然不错，但似乎过于笼统和抽象了，也有些“取巧”的嫌疑。我个人认为，当今市场条件下，古书经济价值自有其权衡体系，以文献价值为主的“内在蕴含”，只是这个体系中的一部分，甚至往往还不是起主要作用的部分。而我恰恰更注重这个往往不能起主要作用的文献价值。韦先生在那



篇序言中其实是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悖论”。他对古书市场有着深切的了解，同时，对古书的文献价值也有自己的偏好，所以，韦先生是愿意看到文献价值主导经济价值的。但这是否只是一种不真实的“畅想”呢？至少我是持怀疑态度的，但这并不影响我对于古书文献价值的热衷和宣扬。

我是因为喜欢传统文化，喜欢古书，才进入古书行的，那么，坚持发掘“文化价值”，才是我应当应分该做的事。在图书馆工作期间，让我深切地感受到，每个人，都有其可爱的地方，每本书，都有其价值，重要的是，理解，发现。连我自己有时都会怀疑，是不是因为始终有这个想法，所以会存在“刻意”去寻找古书价值之所在的问题。即便如此，我还是坚信，只要怀着理解和发现之心，就会离古人越来越近，就会离文化越来越近。当然，这需要有一些诸如版本目录学、历史学、考据之类的基本功。尽管不合时宜，我还是不认为经济价值代表一切。

热衷收藏：这罐心灵鸡汤不一般

藏书报：自己搞收藏，主要藏哪些专题？

陈琦：我自己比较看重两方面的书籍，一是医书的活字本，一是湖北的地方文献。医书活字本是从1997年前后开始当专题来收藏的，差不多十年了，收了有一百来种。曾经去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上海中医药科技大学图书馆，以及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看过，后来又仔细读了《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中活字版本的著录情况，我这一百来种，目前来看，应该是数量最多的医书活字本专藏了，其中不少是未经著录的。估计传世的医书活字本大概不超过150种。

当初想收藏这个专题，除了市场上正好集中出现了几种医书活字本，还因为在写了那本《武汉图书馆馆藏古籍善本书志》以后，总想再写点什么。那会儿，专家们有一个争论，说版本学到底是不是书皮子学问。我觉得这不是问题啊，版本学就是书皮子学问。要证明这一点，我觉得医书活字本是绝好的题目。我不懂医，那么，就只能从“内容”以外的部分着手，做“纯”书皮子的研究。十年的时间，写了有20来万字，自我感觉当初的“追求”还是不错的。当然，现在回头想想，多少还是有些好笑，就当是自娱自乐吧。

古书行的朋友在一起，经常会说，当初要是不买书，拿那些钱去买房子，现在

就如何如何了。然后就会有人问，重来一遍，是买书还是买房？脑袋似乎被门挤过的人们，竟然大多还是老老实实地选择买书。每当想起这“笑话”，我就会对自己热衷收些不起眼、但收购价绝不算低的湖北文献感到些许欣慰，觉得吾道不孤，觉得“生意人”不以经济价值为追求标准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我的湖北文献中没有什么珍稀的明版或精写刻本，全是些畸零小册，时代不早，版本普通，甚至，很多书籍的作者还不能算“名人”。总在想，这些不起眼的书，我不收过来，恐怕永远没有重见天日的一天吧，恐怕说不定哪天就灰飞烟灭了吧。在这种近乎“病态”的收藏观的驱使下，我收了大概一百来种湖北文献。好在这些书自有其价值。曾经在《藏书报》上连载过几篇《湖北文献拾掇记》，看过的朋友就会明白，我说它们不起眼，真不是谦虚；说它们自有其各自的价值，也不是无故拔高。

藏书报：从收藏到研究，再到出版成果，您是如何做到的？

陈琦：这儿也许才真有个“取舍”的问题吧。如果太善于经营，是不是就不会有太多的时间去读书、思考呢？所以说，祸兮福之所倚，还真有道理。只是我这种取舍多少有些被迫的意思，天生不善经营，没得选，当然，我是很喜欢这种没得选的。除了古典小说，我也会看网络小说，我很

羡慕会写小说的人，但我写不来。韦力先生对我能写出不太“学术”的文字已经很觉欣喜了，要是写小说，估计惨不忍睹。但是，活了几十年，我们每个人不免都会有对人生，对社会，对家人，对朋友，对事业的各种看法，都会有将这些想法写下来的冲动。没有这种冲动，博客、微博、朋友圈，哪有生存的空间？我自然不能免俗，只是因为性格原因，不太适合公共交流，但写自己想法的意图，和大家是一样的。这本书算不上什么“研究成果”，它是在我自己的“朋友圈”煨的一罐心灵鸡汤。

藏书报：“让古书说话”，怎么解读？

陈琦：我那本书原来不叫“让钞稿本说话”，这个书名是布衣书局的胡同给起的。我们在生活中积累了很多的想法和看法，这些想法和看法会决定你如何看待历史，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如何看待古书中的人和事。多思考，多反省，多读书，就会觉得生活是活泼的，古书不是死气沉沉的。我一直觉得古书很亲近，因为它自己就会说话，会检验你的思想和思考。从表面上看，是我们“挖掘”出了古书中的历史，其实，是古书觉得你有足够的阅历和洞察力，才会开口说出自己的故事。如何“让古书说话”，和如何让工作做得更好一样，首先自己要有“准备”。成天迟到早退还想拿全勤奖，天下有这样好的事么？

那些与古书相伴的日子



留存在黄土高原的《永乐南藏》

□陕西郎菁

明代先后刻印了三部官版大藏经，一般以刻印时间和地点区分为：《洪武南藏》（又名《初刻南藏》）、《永乐南藏》（又名《再刻南藏》），先后刻于南京；《永乐北藏》，刻于北京。《永乐南藏》据洪武本重刊，而略有更改，开雕年代不详，大约在洪武本被烧毁的永乐六年（1408）后一两年，至迟在永乐十七年（1419）已经刊成。完工后的版片收藏于南京报恩寺，开放供民间各寺院请印，至清初仍有刷印活动。康熙末年《嘉兴藏》完工后，即取代“南藏”成为通行的大藏经版本。乾嘉年间“南藏”经版还在，但请印者寥寥。咸丰六年（1856），《永乐南藏》经版随报恩寺及琉璃塔毁于太平天国战火中。

留存榆林的《永乐南藏》残卷

榆林市星元图书楼的这部《永乐南藏》残卷，是在古籍普查审核工作中遇到的，经初步整理归并平台上98条相关的数据，计有88种1107册1099卷，不足全藏的六分之一。这批佛经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六百卷》（存231卷）第161卷“寒一”号，终《密云圆悟禅师语录十二卷附年谱一卷》（存11卷）“鱼十三”号。对照《金陵梵刹志》所附《南藏目录》，并参照《中国古籍总目》著录《永乐南藏》子目，该藏的千字文帙号、顺序与之完全一致，其中包括了万历续藏（仅存“旷”“亩”“我”“艺”“熟”“赏”字号经卷），及清顺治十八年（1661）增刻“鱼”字函经卷。说明这部南藏是三次续刻后的清初印本。

榆林市星元图书楼的这一千多卷佛经，在该馆古籍普查平台上按零种给号，有的一种经分做数种，或两种混为一种，因版本年代不清，仅著录为“刻本”，具体入藏情况不详。查其馆史资料，1974年该馆恢复开放时，仅有马列毛著等政治读物不足万册。次年在馆长王玉珍多次交涉下，该馆从县公安局存放的“文革”查抄图书中，整理抢救出一批珍贵古籍和文献资料。从这段记载看，佛经入藏有可能来自此时。

定慧寺雍正年间请印

这批藏经全部为经折装，装帧版式一致，开本高30厘米，宽11.2厘米，封面为绢本，有褐色、蓝色、绿色三种，多已残破。正中贴纸质经签，宋体，上为经名，下为千字文号及册号，阴文，置于黑底圆形边框内。每版30行，折为5个半页，半页6行，行17字，上下单边。卷首经名之下刊千字文号。牌记为长方形双边框，上覆荷叶下坐莲花样式，方框外右题“江南陈龙山经房虔造”、左题“住南门内都使司对过”。卷末有护法神韦陀立像，卷首有佛说法扉画，都很符合李际宁老师《佛经版本》一书所述《永乐南藏》的基本特征。另外还有多部经卷在版间空白处、包括牌记页空白处镌有各种微小花形图案。

该藏牌记内除个别空白外，大部分都有墨题：“定慧寺/雍正某

年某月吉旦造/大藏经弟子某某/请经住持照秀 照鼎叩”，记录了这批大藏印装的时间、请印人和印经地：清雍正五至六年（1727-1728）江南陈龙山经房印本。查张秀民先生《中国印刷史》，该经坊为明代南京较著名的书坊，具体位置牌记上记：“南门内都使司对过”。

榆林有定慧寺，道光《榆林府志》记载：“在南城街，康熙二十七年（1688）建”。“南藏”留存榆林，最大可能就是该定慧寺请印到榆林的，请经的定慧寺住持僧名“照秀”，搬经僧名“照鼎”。

后印本字体情况复杂

该部《永乐南藏》由于是后印本，字体情况比较复杂。多数为永乐年间刊版的原藏的手写欧体字，仍沿用宋元以来刻藏字体，但稍显粗率；万历、顺治两次续藏，所见均为仿宋体字，即方体字、硬体字；另外还有原藏中出现的补版的字体，多数会有助刊人姓名，目前发现补版所用字体，多为仿宋体字，也有个别仿原版的楷体字。

《永乐南藏》依据请经条例，从明末到清初都有印经活动。因印数大，加之某些经典请印者可单独选印，导致经版印刷次数不一，某些版片越印越邈邈，自明万历后多有修补。其修补多依靠施主捐助资刊，因此多在卷端版心留有施经人（信佛者施资助刊）、刻经人的名字，甚至职官、纪年的刊版题记。如：寒一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一百六十一：佛弟子学诚刻；唐十号《大集须弥藏经》卷下：乙巳年杨氏书祥刻；训一号《四分律藏》卷一：佛弟子薛必科刻，等等。其中薛必科，查到是清顺治戊子科贡生，江宁人，官知县。说明这部经为清初补刻。以上都应是万历三十四年（1606）之后至清初的补版，都为仿宋体字，粗略统计有15部。

还有一种补版采用仿原刻的楷体字，清秀端庄，版心也有助人姓名，如青一号《注法界观门》：一册之中两种字体，有楷体字，有宋体字。

上述有刊记的几卷，部分请李际宁老师与国图藏原刻本对照过，国图本并无此题记，说明是补版。据刊记人名情况，多为清初官员，应是清代初期补版。只是这些补版并非全为仿宋体字，也有少量仿原本的楷体字。

《永乐南藏》因其特殊的请印制度，比其他明清大藏存世数量稍多，但因补版情况不一，版本情况也非常复杂，值得进一步研究。加之陕西存世大藏并不多，对于地县馆来说，能保存这样一部残藏也实属不易。以上仅是根据榆林市星元图书楼古籍普查平台上提供的有限书影做了初步整理。有些疑问处及更多未反映出的信息如刊版题记、扉画等，还需要我们到馆藏地对这部大藏逐册进行仔细核查，详细著录，研究清楚这部《永乐南藏》补版的年代、比例、来源等详细情况，及其版本、文献等方面的价值，从而保护好这部有幸留存在榆林黄土高原上的《永乐南藏》。

胡积堂笔啸轩位于安徽省黟县西递村履福堂。胡积堂字琴生，号洄坞山人，为著名徽商胡贯三之孙，生卒年不详，大约活动于清中晚期，生性嗜书，精于星历算学，富藏弄，阁中多精妙上品，曾著有《笔啸轩书画录》，现存有乙照斋道光十九（1839）序刻本。据《笔啸轩记》所载，道光十五年（1835），胡积堂“营构书馆于（丁）峰之麓，峰峙馆后，如卓笔知，故曰‘笔啸轩’，以为子弟肄业之所”。当时的笔啸轩分上、中、下三楹，左右皆有房间，书楼主人胡积堂“或抚琴而鉴古，或饮酒而赋诗，子弟诵书声相与和答，其喜可知也”。又有记载称：“山人好藏书，积至数千卷，朝披夕阅，有所得辄以笔记之，岁久汇成四册，题曰《洄坞山人笔记》。”

据小姑娘说，履福堂极大，太平天国时烧了一部分，其中就有笔啸轩，当年笔啸轩收藏的古籍及书画后来都捐了，但什么时候捐的，她也不清楚：“现在故宫博物院里有一部分，台北故宫博物院里也有一部分，反正我们家是没有了，只剩下‘履福堂’这块匾，还是藏起来用稻草盖住才保存下来的。”

说话间，有导游带着一批游客进来，小姑娘瞬间转换了姿态，由一副无所谓于世故，变成了端庄认真的艺人，坐直了身子开始表演竹刻。虽然动作很快，但我能感觉出，她于此道并不娴熟，而她所娴熟者，是用那广告式语气向客人介绍履福堂，略讲胡积堂的收藏之后，便开始重点介绍她面前的竹刻，她把自己的作品讲解到了民族艺术的高度，说这



胡积堂笔啸轩：藏书无人问，美景任人游

□北京 韦力

歙县黟县一带古村落极多，因为发展旅游之故，许多村落被圈起来成为景点，西递村则为其中名气最大的一个。履福堂在村子并不起眼的地方，门口有介绍，称始建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其外观看上去是两层，实际却有三层，前厅后堂，前厅里挂着“履福堂”旧匾，四壁悬着一些书画，一个角落陈设着待售的竹刻艺术品。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坐在前厅，桌上摆着刻竹的工具和一些刻好的作品。后堂还有一位40余岁的男子，是胡积堂的第八世孙，守着一个古董摊儿，摊儿上摆着几本影印成民国石印本的老皇历和医书，字迹模糊，这种书几乎西递村内家家都在售，每本售价在30至50元之间。

我问前厅里的小姑娘当年的笔啸轩在哪里，小姑娘说得很干脆：“烧了。”我又问，什么时候？小姑娘说，太平天国的时候。我再问，那遗址在哪里呢？她仍然答得很干脆：“在我家菜园子里，现在是农家乐。”小姑娘的干脆利落与满不在乎颇令我好奇，后来进来了一对游客，通过她的自我介绍，我方得知，她就是胡积堂的第九代后人，并且通过她的言辞我也知道了，挂在她头顶后方的那张黑白大照片，就是胡积堂本人。

种竹刻代表着徽州文化等等，而眼前的这些游客一番赞叹之后，没有一个人购买她的杰作，于是又乱哄哄地跟着导游出门，奔赴下一个景点。

我在履福堂里大约停留了两个多小时，前后来了数批游客，都是被导游带领着，每进一批游客，前厅的小姑娘就像复读机般推销一遍，她每次所说的一字不差，以至于口气及停顿的时间和每句话腔调的高低，都完全没有变化。我真想过去劝她，多编几套词，这样让自己的所讲变得有趣一些，而后厅的男子就听着导游一遍一遍地讲地主压迫丫环的故事，两个多小时里，他们没有卖出去任何东西。

离开了履福堂，来到当年的笔啸轩遗址。一个小小的后园，摆着几副农家的桌椅板凳，一派田园风光，取代了旧时书香。

